

### 专题

◄（上接7版）

子》中发现其雏形。当然,这就要把孟子的政治思想从“以民为本”的空泛陈言,或“三年之丧”一类的特别礼制中超拔出来,具体进入讨论。以“井田”而论,孟子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设计,其意远非所谓“古已有之的公田制度”一言可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这在其后系统论述的养民、教民以达老安少怀,进而文明化成天下的论述中,有着根本的意义: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

简单说,此即“五亩之宅”作为家庭私产之不可侵夺的性质。两相比较,可谓昭然。而此“百亩之田”,即使仍为国家之“公田”:民授田而耕,需尽国家之义务,但也迥异于租田于贵族/私家之情形,何况在另一处孟子明确说过:“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百家皆私百亩……”(《**滕文公上**》)拥有土地乃人民天赋权利之意,又何可掩?

进而言之,对孟子来说,国家存在之目的并不在其政府,而首在其民。政府非但不该巧立名目以夺民时、妨民利,且首须为民制业,使民有“恒产”,得以“养生丧死而无憾焉”。所以,孟子之政治哲学实堪称“以民为先”的“先民”哲学,绝非后世的“先官”、“先军”政治可比。

但在孟子的制度设计中,真正具有目的性意义的,却仍在于使民有接受教育、养成人格、参与政治的权利。“庠序”为三代学制,“教民、养民”之义,确定无疑;故此处先引证孟子有关人民政治参与的制度论述: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见可杀焉,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梁惠王下**》)

“如不得已”,绝非后来所说勉强或迫不得已,而恰恰是说,“国君以“为天下得才”为“不能容已”之赏心乐事;进退生杀的把柄,也既不操之在己,亦不在左右亲宠、朝中大夫,而唯在“国人”之

手。“国人”,一般都说为国中各色人等,“国人皆曰”遂被解为“民意”或“社会輿情”。但孟学名家黄俊杰却指出,“国人”是一个在春秋时代有“与闻国政权力”的“社会政治群体”;他们在在野的民意代表身份,内可决定国家大政,外可影响合战大局。黄先生的判断不仅有孟子文本及周边文献之证据,并涉及中国古代城邦政治制度研究的成果(黄俊杰《**孟子**》、杜正胜《**周代城邦**》),绝非故作惊人之语。但迄今为止,学界的主流意见仍是:“孟子民贵之论,与后世哀民、悯农之抗辞并无二致,仍不过天下本为民办、民有之意,而于人民自治(by the people)之观念与制度,则绝未梦见。”因为春秋后世的败坏,尤其是秦汉帝制的压抑,“国人”议政制度在退出了历史舞台的同时,也逐渐退出了人们的历史记忆。这使后人人心中的孟子总多了些慷慨抗议的激越之风姿,而少了实行者剑及履及的态度。但这只是后来者的误会。徐复观先生当年在另一处孟子明确说过:“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百家皆私百亩……”(《**滕文公上**》)拥有土地乃人民天赋权利之意,又何可掩?

其实,无须穿越群山,去寻找共和国的遗址(伏尔泰语)。掀开帝国制度的帷幔,就能看见华夏文明的真正方向。而幸运的是,孟子也留下了足够多供我们探询的线索。

#### 恒心之获与恒心之持:孟子的政治奠基

让我们从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作为以500年一人自期的旷代大哲,孟子似乎还不如一个现实主义政客,不仅不明白民之“好利恶德、顽固不义”,而且一以民意之好恶,作为施政的标准?“(民之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这实已穿过《**大学**》好恶由民的程度:“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难道孟子真如一些现代政治学者所说,完全是在“奖励国民依赖根性”吗(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可问题是,据一些“更接近”西方的海外学者判断,这却不仅“绝对不是什么民主主义者”的善意,而且简直可以

说是马基雅维利式的邪恶心智,或本土道/法家“若欲取之,先必与之”的厚黑之术:

《**孟子**》一书中就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命题,而且还有像“为政……不得罪于巨室”这一类,只有在官僚仕宦手册中才找得到的庸俗条文。(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处结构**》)

是耶非耶? 孟子的先民政治,究竟是幼稚天真的理想主义的同乐园,伪装的、精英主义的“贤人政治”(meritocracy),还是邪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必须承认,孟子是肯定过“圣人治天下”的(《**尽心下**》),并不讳言“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天下方有平治之望。而如此圣王在上,中有贤德,人民不是将更难逃法网,且将死于“天理”之下吗?然而,统治并非政治。统治的“真理”,却并非政治的理由。

对孟子来说,政治不仅牵涉到人民的同意,而且,好的政治不过是使所有人自我完善的生活方式。《**尽心上**》曾以“霸者之民欢虞如也”,“王者并不知晓“国人”的相关研究”的情形下,已对“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结构及人治与法治问题”进行过特出的研究,并专就此节引文进行追问过:“如果这尚不算民主制度,又是什么呢?”

而其,无须穿越群山,去寻找共和国的遗址(伏尔泰语)。掀开帝国制度的帷幔,就能看见华夏文明的真正方向。

对此一自我发展和完善,自然也不是没有问题可言。比如,为什么要把人民视为处于“不仁”状态,而只能在善良的王者眷顾下改过迁善的蒙愚之辈? 人民与王者同样是人,凭着天赋的权利,他们应该是从政治契约订立“一开始”就拥有平等的政治资格的。“王者之政”不正是对人民天赋权利的欺骗和剥夺吗? 严复先生当年的《**辟韩**》已经诘难过了,虽然针对的是尊孟的韩愈。好在,严先生也并不相信卢梭的“自然状态与权利”,而从一开始遵循的就是孟德斯鸠及其影响下的以文明秩序为基的理路。

但,孟子并非“政治的道德家”,借用康德的概念,而是“道德的政治家”(moralischen Politiker); 孟子道孟子真如一些现代政治学者所说,完全是在“奖励国民依赖根性”吗(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 不引证亦可知,此天下非先世圣、贤之天下,而乃人、民之天下; 此天下非一人一家一族一教之天下,乃天下为公之公天下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读孟者咸知,孟子生前,已被视为一迂阔、不切政治实际的道德主义者; 离世后更被以

礼法自鸣的荀子等视为“陋儒”。然而,如上的分梳使我们正可以看到,孟子在“道德与政治”之间所作的分别与选择。对孟子来说,政治的目的是须合于道德的; 作为一个古典时期的思想家,这样的反应是自然的;他对时政的批判,更经常使之成为一个“强论点”。但政治过程的开始,却并非基于完满的道德,而是仁心的恢复,或者说,自由意志的觉醒与自由的实践之要求; 这则是完全政治的,这是一个更强的论点。

朱子当年曾将有无“恒心”的原因,归结为是否“尝从事于学问”。但孟子的方法,却不是把他们“突变”为士人,而是使有恒产,使无匮乏,使之在消除其匮乏之虞的同时,复苏其仁。对此,孟子有一个不易觉察的证明:

使有菽粟如(有)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尽心章句上**》) 换言之,是对匮乏的忧惧,使民铤而走险,丧失其仁的。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求难避易?

但仁心的恢复,仍不等于“恒心”的建立,而需要进一步的培护——因为,在“饱食、暖衣、逸居”的状态中,人也可能使仁心放失,无所不至,同样只是“近于禽兽”而已。“教”的问题,由此也就成为必然:

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

而我们发现,这一“教之”所及的内容,由一身而通于家、国,正好是“政治”的范围。换言之,恒心之获得,亦即仁心之有恒,正待乎“政治”的建立与推展。

#### 天下的化成与一个“人”的典范

但以上所言,仍只是“五十(或,七十)里之国”政治的肇建。

它是一个文明的学校,英华荟萃之所,人人欲往;它是一个文明的殿堂,教化展示之地,天下风从。由此展开的,才是新的天下的化成。孟子之“平治天下”,正指此而言。疏我亦愿将孟子心中尧(“放助”)的遗言,作为华夏文明“政治人”成长的叮咛嘱托,放在后面: 放助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滕文公上**》) 是,是,是“自得之”而“振德之”。“为仁由己,而由人乎?”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迪 liudi@whb.cn

### 专题

# 儒商与中国传统商业伦理

### 本报记者 刘迪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分享自己的哲学、商业哲学。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也许无力解决人类尽早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但是这正是中国儒商今天应该登场的原因。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令世人振奋的经济奇迹。对此,中国企业家功不可没。商业行为的背后,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那个广博而精深思想宝库。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商业哲学和伦理,助推了当前的经济腾飞。儒商——这一雅致的称谓已被世人所广泛接受。

回顾中国企业的成长之路,历史上儒商诚实守信、急公好义的形象,涵养着当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研究日益深入、系统,中国的企业界和商界开始自觉塑造儒商形象,着力培育儒商精神。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国儒家思想与当代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将儒家文化与企业文化进一步融合凝聚,已成为当代中国学界和商界挑在肩头的重任。

为引领儒学与社会经济的结合,彰显儒学的经世关怀,日前,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和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华儒商论坛。儒家的经济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困境,以及基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核心价值

观发展起来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念,如何为中华民族开拓一条通往世界伦理的康庄大道等问题,成了与会嘉宾讨论的热点。 儒家经济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困境,以及基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核心价值

#### 子贡开创“义利合一”的儒商文化

儒商——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商业与文化概念,它在古代典籍中的出处似乎无据可查,但人们普遍认为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中华儒商的始祖。

在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张维看来,如果作为专有名词的“儒商”确实在古代文献中出现得很晚,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很早便流传于民间的概念,作为百姓对于那些不单纯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人的赞许。这一类商人的共同特点在于以儒家的价值观念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

### 2017年1月20日 星期五 文史匯学人 — 专题

# 儒商与中国传统商业伦理

### 本报记者 刘迪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分享自己的哲学、商业哲学。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也许无力解决人类尽早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但是这正是中国儒商今天应该登场的原因。

孔子说,“义以生利,利以平民”。中山大学原哲学系教授、博鳌儒商论坛主席黎红雷认为,这句话道出了儒家义利观的本质——义是拿来生利的,而利则是用来安抚百姓的,实为儒家经营哲学的精髓。

儒商的出现并非简单的商业现象,而是一个文化现象、哲学现象。中国的商业文明萌芽得很早,但恰恰是由于受到了儒家文化重义轻利,以及中国封建时代重农抑商观念的影响而发展缓慢。

但是,从“重义轻利”到“义利整合”,从“重农抑商”到“农商兼举”,中国的商业文化始终沿着一条自己的道路不断创新、发展。直到资本主义的出现,拦腰阻断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那条商业文化发展道路。

而以“唯利是图、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本质的资本主义精神,与中国文化道路南辕北辙,却把中国商业发展模式的生存空间挤压殆尽。中国历史上从不缺少儒商的身影,遗憾的是,那只是个体的故事,而非一个被普遍认同的概念、形态、缺乏理念与理论的支持。 “儒商”是“儒”与“商”的结合体。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认为,儒商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 既是儒者的楷模,也是商界的精英。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追求兼善天下的理想情怀。

“儒商”是“儒”与“商”的结合体。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认为,儒商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 既是儒者的楷模,也是商界的精英。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追求兼善天下的理想情怀。

“儒商”是“儒”与“商”的结合体。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张立文则主张从五个维度去理解儒商精神:一,道并行而不相悖。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诚,儒商应以诚信为本。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四,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儒商的“富有”,不仅仅是财富的累积,更应该是道德的富有,心灵的充实。“日新”则要求企业力主创新,企业家的光环,而是企业家自觉的选择; 儒商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行为方式; 儒商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责任;儒商不是一种境界,而是一种担当,表现为企业家对于企业、社会、员工及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担当。

“所谓‘当代儒商’就是践行儒家商道的当代企业家”,黎红雷认为,儒商不是外界套给词“儒商”确实在古代文献中出现得很晚,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很早便流传于民间的概念,作为百姓对于那些不单纯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人的赞许。这一类商人的共同特点在于以儒家的价值观念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

### 专题

养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制度的支持与约束,孔子时代谓之“礼”。 儒家重义务、重责任,而不重权利;重仁义,而不重财富,却不排斥财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所以,儒家思想的现代成长并不排斥对于财富的追求,两者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儒商”为媒——义中取利,在创造的价值中只取一瓢饮。

多年来世界主要国家长期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金融业的畸形发展,从创造价值走向追求利润。一夜之间,似乎所有东西都可以证券化了。全世界的资金从生产性投资,转向了金融性投资。然后,财富分配不均、能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这些财富生产的“副产品”,自是亚当·斯密始料未及的。回归以儒家伦理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节制物欲,将伦理放在利益前面,责任放在权利前面,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孙震十分认同郭台铭先生出席互联网大会时的一段言论,“教经济不能靠西药,而要

用中药,因为西药只是治标,中药才能治本”,要采取长期的疗法,种下成功的种子,然后L型的经济发展曲线才能转向U型,发扬儒商伦理才是世界经济的治本之道。

司马迁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宋代宰相赵普言,“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宋明以来,人们往往把关注点放在了儒家伦理之上,却忽视了儒家对于管理的重视,忽视了儒家的治理功能。

#### 义中取利,在创造的价值中只取一瓢饮

原台湾大学校长孙震教授将世界经济发展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公元元年到 18 世纪是漫长的“传统停滞时代”;18 世纪下半叶至今,人类历史迈进了“现代成长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成长于传统停滞时代。这个历史阶段当中,全民的福祉来自社会的和谐与安定。所以,中国文化只求和谐与安定,并不鼓励社会成员整天钻研财富的积累。

如何实现社会和谐与安定呢? 每个社会成员必须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履行各自的社会义务,尽个人的本分。理论上,人与人之间相处所维持的关系为“伦理”,伦理的实践是“道德”,道德表现在行为之上就是“品德”,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就成了君子。儒家文化期待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君子修己安人,然后安天下百姓,从献身社会的自我实现中得到人生的幸福。然而单单依靠个人修

（下转 10 版） ➔